

《不完美受害人》：形象与困境的现实主义呈现

郑焕钊

近日收官的《不完美受害人》，以一起疑似性侵害案为开端，探讨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受害的隐秘性和诱惑性，呈现女性受害者的沉默与反抗的困境，因其题材强烈的现实性而引发观众的共鸣与争议。

从叙事上，《不完美受害人》存在不少令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叙事节奏过于缓慢、女警官晏明预设立场过于鲜明，以及赵寻在某些情境中行为逻辑的不合理等。然而，与当下“她经济”视野下女性题材剧的“话题消费式”叙事不同，该剧通过对职场不平等关系下受害者赵寻在事发之后，从一开始的态度模糊、否认受到伤害，到五天后报警指控，以及因证据不足警方撤案后，反遭民事起诉，被人肉、被网暴，遭受爱慕羞辱、工作失业、生活失序等过程的反复进行了多维度、多立场的揭示和剖析。从而，该剧表征和反思了不平等关系中被受害者普遍性的心理处境，呈现了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侵害发生的隐秘性、诱惑性和复杂性，体现了女性题材剧创作上颇具勇气的现实主义探索。

聚焦“不完美受害人”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方面，该剧以悬疑叙事的方式，透过非暴力强奸案的受害者赵寻在事发之后，一系列反常而令人疑惑的行动，试图还原“不完美受害人”遭遇受害后的创伤应激和复杂的心路历程，呈现职场不平等权力关系下，“不完美受害人”的人格形象，以及其作为反抗者面临的诸多困境。

在国产影视剧中，《不完美受害人》第一次以群像剧的方式，将镜头聚焦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关系中的“不完美受害人”（剧中的赵寻、林阕等）。所谓“不完美受害人”，是相对于具有强烈反抗、法律事实确凿的“完美受害人”而言，主要是指没有发生激烈的反抗，由于人性弱点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瑕疵的受害人。因为这种“不完美”面临着法律认定、道德审判与内心交战的诸多困境。

面对“绅士”“体面”的董事长秘书的非暴力强奸，作为董事长秘书的赵寻为何不在现场第一时间否认受害，还配合体检，却到公安局笔录时才否认强奸？为何在事发36小时后接受与成功的见面且当面否认成功强奸，以及在父母都签字后，坐车启动到国外途中反悔拒绝成功让其海外躲避的安排？在第6天报



▲从左至右为《不完美受害人》中林允饰演的赵寻、周迅饰演的林阕、钟楚曦饰演的晏明、董洁饰演的李怡、陈数饰演的辛路。

案后，又为何要隐瞒自己片刻清醒的事实？对这一系列行为的反常与自相矛盾的心理动因的揭示，是《不完美受害人》重要着墨之处。该剧以林阕作为加害人律师代理人的前置调查，以及女警官晏明的刑事侦查询问，对赵寻的心理逻辑和行为逻辑进行近乎抽丝剥茧地剖析，揭露人性的懦弱、贪婪和虚荣如何使赵寻一步步成为“不完美受害人”。

而赵寻作为最终勇敢向成功说出“不”字的反抗者，又面临着法律事实上的证据不足、网络“荡妇羞辱”的舆论审判以及现实人肉暴力，陷入法律、道德与内心的多重困境。“不完美受害人”的困境，揭示了不平等关系中受害的隐秘性、诱惑性和复杂性。权力高位者充分利用人性存在的弱点，以“爱的名义”进行精神控制和物质诱惑，让受害人难以直接反抗，或者产生妥协，由此展现了压迫和受害的隐秘性和复杂性。而受害人因为其现实权力压迫面前人性存在的懦弱、虚荣和贪婪的弱点，使其成为有瑕疵的“不完美受害人”，使其无论在法律事实

的认定上，还是在舆论道德审判中都处于不利的位置。赵寻选择“面对”与“反抗”，但由此所带来的法律事实的不足不得不被撤案，而在现实中也面临着舆论的指责，无法获得家人、朋友、同事的理解，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可以说，对赵寻作为“不完美受害人”及其反抗者困境的刻画，是极端而深刻的。

注重复杂利益中女性之间关系的真实呈现

另一方面，与一些女性题材剧简单的性别视野和认知视野不同，《不完美受害人》试图通过对女性关系的复杂呈现，深入讨论不平等侵害关系中的性别互助关系的议题。

剧集注重复杂利益中女性之间关系的真实呈现。女性并非一个单一的群体，也并非简单的女性互助，具体处境中女性甚至可能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

者。比如李怡，坚定地站在成功的立场为成功辩护，收买报警人尹声隐瞒证据，为迎合成功的权力欲望，操纵媒体对赵寻发动爱慕羞辱，更因其嫉妒心理，不惜私自行动开展人肉暴力，成为摧毁赵寻的坚定帮凶。

如果说晏明对于赵寻的帮助更多依赖于其过去办案的历程、直觉与敏感所带来的正义的“偏执”，那么林阕在剧中内心中所遭受的煎熬与行为转变的心理和经历过程，更能显示出女性互助背后的具体处境。

林阕的角色是三重的：女性、不平等关系中性受害的受害者，以及加害人代理律师。与赵寻作为最终的“反抗者”的角色及其面临的困境不同，林阕则是作为没有选择反抗的“妥协者”形象而出现。她是师生不平等关系中的受害人，但也受益于导师的帮助而在职业上平步青云；她在职场上作为弱势乙方而不断面临着强势甲方的滋扰，却因为职业立场需要为成功这样的强奸者代理辩护……因而林阕视点当中既包含着来自专业

素养所带来的客观与冷静，呈现出法律之眼冷峻的一面；同时也因为其作为不平等关系中的女性受害者所具有的共情和温暖的一面。与赵寻步步陷入绝境的线索相伴的，是林阕从成功的代理律师到拒绝代理其民事诉讼，不惜以牺牲自身十年职业成就为代价，以公民身份代理赵寻民事诉讼的过程，也是她从不敢面对自己的沉默状态，到最终打开心门释放勇敢的过程。

剧集正是透过赵寻案，来展现林阕作为“不完美受害人”在妥协之后所遭受的“如影随形”的内心煎熬，更在剧集后半部分，通过其力图阻止对赵寻伤害的努力的失败，最终坚定了选择的主线，从情感逻辑、心理逻辑和叙事逻辑上，颇具说服力地展示了女性形象的复杂性，以及女性互助关系建立的合理性。

在“她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以群像式都市女性成长为主线，呈现当代城市女性所面临的生活、工作和情感的问题与困境，强化女性性别议题的女性群体剧得以崛起。当代社会中的女性困境，既

是性别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更是一种性别认知的观念性后果的潜在作用。女性题材影视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透过女性处境的叙事性建构，去呈现和揭示社会和观念的根源，以促进社会进步。

毫无疑问，赵寻作为“不完美受害人”的角色是不讨好的。该剧播放期间，弹幕中就有部分观众对她发出“既当又立”的道德指责，事实上正显示出《不完美受害人》的现实意义：现实题材影视剧不仅要写当代生活，更要通过对当代生活内在的肌理极其深入的逻辑的抽丝剥茧的叙事呈现与揭示，以揭露现实的矛盾与观念的偏差。面对赵寻遭受的非暴力侵害案，剧集通过晏明与赵寻、秦队之间的论辩，通过成功“不认罪”的自我逻辑的言说、通过晏明与林阕之间的多次的观念碰撞，更通过林阕与赵寻内心的反复交战，让“不完美受害人”议题在多角度中，呈现出认知的差异性，并由此显示出坚持正义的不易及其坚持的力量。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芭比》：一种“不可判定的电影”

桂琳

作为一部玩偶类型片，很多观众对《芭比》的期望可能并不高，认为其会是又一部好莱坞爆米花电影。但《芭比》好像还并不那么简单，它似乎提供了一些以往玩偶电影没有的东西。而且这部影片难得地做到了皆大欢喜，无论是观众或专业影评人都对这部电影评价不错，业界甚至预测它有可能取代《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成为今年全球票房冠军。

这让人难免好奇，《芭比》的商业成功到底来自哪里？

既保持控制，又让所有人进入

《芭比》之所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并非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形式。借鉴电影理论家埃尔斯瑟的理论洞见，我称之为不可判定的电影。不可判定，指的是这类电影内部往往蕴含着多重层面，甚

至自相矛盾的内容，从而使得观众很难对其观点和意义做出明确的判断。比如如果我们把《芭比》看作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电影，但它明明又是为资本扩张在提供服务。如果我们认为《芭比》积极批判父权制，但其中身着各色服装，光鲜亮丽的芭比们又明明是在为父权制提供更多被看的美丽客体。《芭比》自身所携带的这种自相矛盾和不可判定性，反而推动了票房的节节高升。

在这种不可判定的电影中，一切皆可嘲弄。《芭比》狠狠嘲弄了资本，那个滑稽又虚伪的美泰CEO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都像一个小丑。比如他一边在得知芭比乐园变成青王国假惺惺地说“你为我做这行只是为了钱吗”，一边又不断暴露他真正在乎的可能就是钱。电影中有一个小细节非常有趣，当格洛丽亚提议美泰可以制造普通人芭比时，CEO正打算否定这个提议，但当站在后面的会计师通过计算告诉他这个主意可能挣大钱时，他立刻改口说，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估计看到这里，观众都被他的虚伪逗得哈哈大笑。电影在这里实际上也将制片方华纳公司嘲弄了一番。因为只要是能挣钱，他们乐意拍任何题材，即使嘲笑自己也毫不在乎。

影片巧妙地通过一个在芭比乐园中作为“第二性”存在的男性肯，塑造他从“第二性”到“第一性”，再到最终摆脱父权制枷锁，找寻真正自我的完整过程，也嘲笑了对两性都构成压迫的父权制。《芭比》更是没忘了嘲讽和解构影片自身，当罗比饰演的经典芭比坐在地上哭诉“我不漂亮了”时，一个画外音出现，“制片方，如果让观众相信这句话，得换个人来演”。这种自嘲相当机智，观众当然知道影片不会换人演，因为这个漂亮的女明星就是影片最重要的吸引力所在。

但有趣之处在于，正是这种无差别的嘲弄也让所有人都在电影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美泰当然得到了它

想要的形象重塑并重新带动芭比的销量。华纳凭借这部热卖电影可能开启新一轮新的类型循环，并在跨媒介操作和知识产权售卖中获利颇丰。专业影评人也能从中寻找到巧思和反讽。观众当然对电影也很满意，从票房和评论就可以看出来。

女性观众不用说，不仅对片中男式说教的调侃和有毒阳刚之气的嘲讽引领神会，更是被格洛丽亚那段长达三分种的独白金句震撼，因为它确实揭露了父权制下女性处境的某种真相。男观众也有收获，不仅电影中的肯那么帅气有型，而且还提供了大量的迷影锁眼供他们挖掘考据和显摆理论。《教父》《太空漫游2001》《壮志凌云》《闪灵》《黑客帝国》等都不是男观众的心头爱吗？难怪这部电影能够做到皆大欢喜。

这种不可判定的电影，正是好莱坞对电影产业进行重组和改造的产物。

从媒介来说，如今的电影必须满足为多重媒介提供各自所需的内容。它在大屏幕上必须依然凭借精巧的叙事和绚丽的奇观做到好看，但又得足够复杂以便于在个人电脑上经得起多次播放。它还必须为社交媒体传播提供犀利的观点和便于记忆的金句，同时设置足量的信息和锁眼吸引粉丝的索引和考据乐趣。

从观众来说，现在的电影更需要在一个人都是自媒体，并且意见极其分裂的环境下获得更多人对电影的认可。因为互联网口碑的波动性、社交媒体反应的不可预测性及影评网站的评分等几乎成为一部影片上映后决定成败的关键力量。

在如上所说的复杂环境下，一种结构模糊和不可判定的电影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保险政策。不可判定性就不再是影片的缺点，反而成为影片所必须具备的标准，因为它能够保证不同媒介和不同观众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实际上，这类不可判定的电影从

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最早是以诺兰、林奇等的心智游戏电影为主导，其中复杂的叙事、超量的信息和多重的变量等不仅为多次观看而设计，也让观众在这类电影中寻找确定意义和真实答案都变得极其困难，这也正构成了这类电影的观众吸引力。诺兰的《盗梦空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作品。但这些都相对比较前卫的电影理念也在慢慢渗透到各种类型之中，尤其是进入大制作的主流影视创作。

如奇幻题材的《权力的游戏》，与之前的《指环王》就构成了鲜明对比。这部剧集的魅力正是基于分歧、不可判定和大量的不和谐。它从头到尾都在分割观众，为其狂热的粉丝提供多角度辩论的享受，而不再如《指环王》这种经典奇幻题材聚焦于所有观众都认同的一个目标和任务。从《芭比》来看，目前这股不可判定风显然已经刮到了原本单纯的玩偶类型片上，我们只要将《芭比》和经典玩偶电影《玩具总动员》对比一下就立刻会发现其中的差别。

既是游戏，又是思想实验

这种不可判定的电影包含了两个似乎有些矛盾但又相互配合的元素：游戏和思想实验。

从游戏来说，既能带来刺激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观影乐趣，又可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可进可退，可守可攻，确实是制造不可判定性的聪明举动。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芭比》中最激烈的“革命”和“斗争”都是发生在作为游戏空间的芭比乐园中。所以无论是肯所建立的父权制王国，还是芭比夺回控制权的女性斗争，都带有强烈的游戏性质。除了游戏空间外，《芭比》还巧妙地借用了好莱坞经典类型歌舞片的故事结构。在歌舞片类型中，通常就是采取一种男性与女性交替、对抗和平行的双聚焦叙

述策略，每个性别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化价值，但歌舞片最终又通过男女双方的爱情结合获得一种喜剧结局。这种游戏性非常强的喜剧类型能够进一步软化影片中本来十分尖锐的社会议题，带给观众相对轻松的观影体验。

除了游戏，不可判定的电影也蕴含着一定的探索和反思。正如导演格蕾塔所说，她在《芭比》这部完全没有个人色彩的电影中也可以放进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因为不可判定的电影允许某种思想实验。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假设“如果……怎么办”，是一种探究困境的方法，或探索显然不可能但可以想象的情况。《芭比》中设置的“如果男人变成‘第二性’怎么办？”“如果女人成为统治者怎么办？”等的假设就部分带来了思想实验的效果，促使观众脱离习见的性别角色和关系，接受更复杂的性别现状，从而在性别问题上具有更强的能动性。

可见，游戏与思想实验的共同点都是启发观众去发现规则设置，并对其反思。而且它们改变了截然对立和剑拔弩张的社会议题表述方式，通过模糊的不可判定来吸引不同的观众，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这类不可判定电影的“革命”性，因为正如《芭比》所呈现的那样，为了获利，好莱坞可能会放低身段地自嘲一下，但他们对电影的控制从来也没有放松。

《芭比》这种新的不可判定的电影到底是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还是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狂欢？我们也只能说不可判定。这种不可判定的电影代表了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某种发展方向，但其通过游戏来玩弄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以思想实验训练我们对后真相状态的芭比乐园中。所以无论是肯所建立的父权制王国，还是芭比夺回控制权的女性斗争，都具有了揭露好莱坞和各种权力操作的可能性。而且因为它们就在好莱坞内部运作，反而可能有一定的效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芭比》提供了一种新的并非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形式。